

独特乡野气质从何而来

——张继“村长系列”小说近作读札

□王德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当大多数人的目光日益聚焦于城市,像张继这样始终扎根乡村、本真书写那片土地冷暖的作家,便更显可贵。张继自1991年开始书写乡村生活,至今已整整三十五年。他在鲁南乡村长大,笔墨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他的语言简省利落,像一粒饱满的玉米粒,散发着泥土的馨香;叙述笔调冷静克制,贴近中国农民含蓄内敛的天性;故事则蕴含内在的喜剧性,洋溢着生命的大欢欣。他的小说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会,更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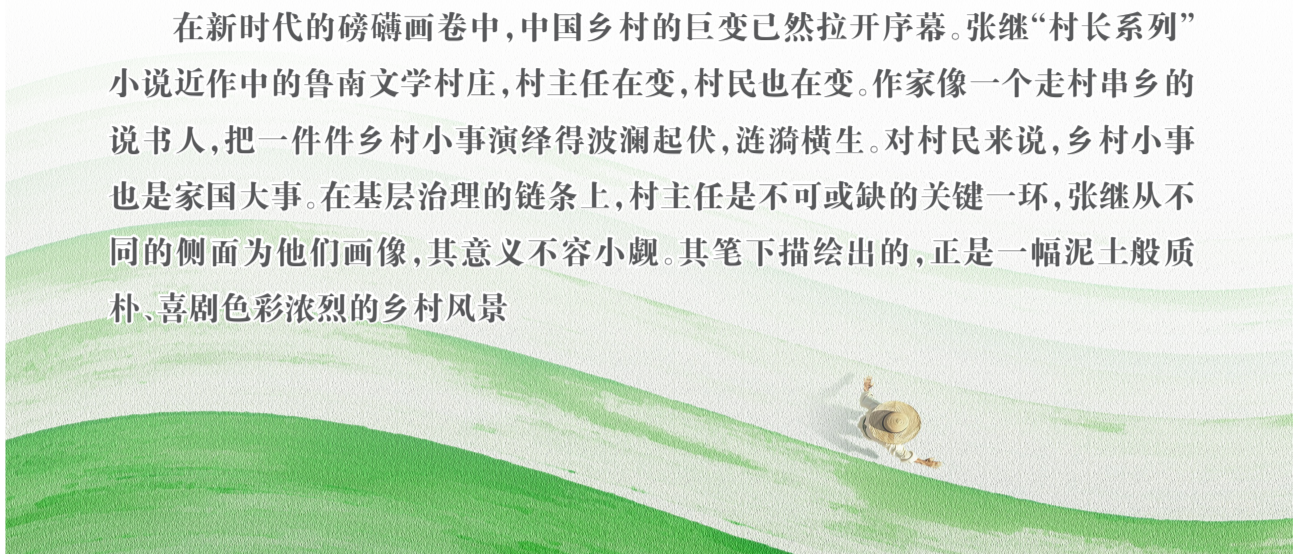
张继从农民中来,本身就是土地的一部分。这让他的小说天然具有一种乡野气质。同样是写山东乡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瑰丽、汪洋恣肆,张继的鲁南乡村质朴、喜剧色彩浓烈,两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景。

张继近期创作的短篇小说《欢迎回到小石桥》(《草原》2025年第9期)与中篇小说《拯救农妇王兰》(《草原》2025年第12期)、《在玉米地里游泳》(《山东文学》2026年第1期)、《黄村愿望》(《长城》2026年第2期),都是写村主任的,属于“村长系列”的新作。写乡村,往往要写到村长。作为中国基层政权的最小单元,村长身处基层治理的末梢,是连接政府与广大农民的重要纽带。塑造村长形象,张继可谓驾轻就熟。30余年来,张继创作了大量以村长为主人公的小说。村长成为他观察、表现中国农村生活的切入口。在张继的文学村庄里,村长系列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李木村长系列”,代表作品有小说《人样》《到城里受苦吧》等,塑造的是典型的村霸形象。这类作品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恶势力把持乡村政权,农民敢怒不敢言的处境。另一类是“四平村长系列”,代表作品有《杀羊》《村长与鱼》等。四平村长处处为村民着想,既要督促村民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又要维护村民的利益,在上下周旋中绞尽脑汁,时时闪现出农民式的狡黠,有时又不免委曲求全,故事往往以喜剧或闹剧的形式收场,但是在为村民争取利益上一点不含糊。这两类村长生活的年代是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那个时期正值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动剧烈,城乡差距拉大,在农民工进城、市场经济冲击的大背景下,村庄发生的变革堪称史诗级的。

与以往写村长的小说相比,张继近作里的村主任不再是李木那样的败类,而多是四平式的好村长,可以说是“四平村长系列”小说在新时代的延续。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张继近作打上了鲜明的新时代烙印。而其相同之处在于,小说最基本的内涵并没有变。首先是一村之长仍然辛辛苦苦地在上下周旋,为村民争取利益,既要维持创先争优形象,又要为村民那里有良好的口碑。其次是小说的故事性依然很强,还是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活的味道。再就是神韵没有变,依然洋溢着内在的喜剧性,戏谑百出,骨子里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劲儿。这是真正来自民间的欢乐,有着生命的大欢欣在里面,是农民群体特有的。

不同的是,张继近期小说人物与主题发生了变化。1995年《杀羊》里的四平村长,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用承诺喝羊汤的方式召集村民参加学习,但是村里一贫如洗,买不起羊,只能“假杀”,可消费尽心机。那时的四平村长,是现实的维持派,缺乏开拓精神。而近作里的村主任,不再被动接受,而是变得积极主动、有所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带动村民致富,振兴乡村经济,成为村主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欢迎回到小石桥》里的村主任万才看到镇上举行了一场在外知名人士座谈会,引进了投资项目,便也想把在外面“混得好”的人请回来,为小石桥的发展献计献策。时间正是春节,出门在外的人要回家乡过年,万才与文书李顺一起盘算邀



在新时代的磅礴画卷中,中国乡村的巨变已然拉开序幕。张继“村长系列”小说近作中的鲁南文学村庄,村主任在变,村民也在变。作家像一个走村串乡的说书人,把一件件乡村小事演绎得波澜起伏,涟漪横生。对村民来说,乡村小事也是家国大事。在基层治理的链条上,村主任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张继从不同的侧面为他们画像,其意义不容小觑。其笔下描绘出的,正是一幅泥土般质朴、喜剧色彩浓烈的乡村风景

请哪些人参加座谈。李顺提议可以请李光头的儿子李越。李越在县城做水果批发,一年可以挣二三百万。但是被万才否了,因为他觉得李越的交往对象很多,“人品不行”。万才和李顺请了几个人,但是到了开会的日子,却一个也没过来。究其原因,是以前经常以集资的名义,让在外面“混得好”的人掏钱为村里搞建设,他们担心这一次也是这样,有些怕了。没想到的是,李越却不请自来,自告奋勇在村里投资建一个果汁厂,带动村民致富。万才还是不同意,觉得李越人品不行,就是投资一个亿也不行。而后又经过颇富戏剧化的情节,万才被迫同意,但心里还是有一个死结解不开,每次经过李越在村里建的果汁厂都会绕道走开。但正如一位村民所说:“给村民带来实惠就是好人。”

《在玉米地里游泳》这篇小说,村主任万才的形象更为立体饱满。临近秋收,小石桥遭遇了罕见的大洪水,熟透的玉米泡在水里无法抢收,村民一筹莫展。万才心急如焚。他从网上看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可以开进积水的田里收玉米,但是村里没有钱,购买不了。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镇上频繁让村里报降雨量,万才不耐烦赌气将降雨量报多了,却不料县长要来小石桥村察看灾情。镇长闻讯特意提前来到小石桥村,与万才一起选定了村里最低洼的一块玉米地让县长察看。但是地里的积水还没达到灾情标准,镇长让村里想办法,鼓励村民说镇上可以派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帮村民收玉米。村民听了干劲十足,将附近河道里的水引进了玉米地,水多得可以在玉米地里游泳了。于是顺利通过了县长巡察,但是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却没有下文。为此,万才多次找镇长沟通,软磨硬泡,要他兑现承诺。镇长说那只是为了推进工作的说辞,不能当真。万才说不能失信于民。镇长妥协了,让万才用镇上的涉农贷款买了一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解决了小石桥村的秋收难题。在万才身上,可以看到四平村长的影子。小说这样评述万才:“这么多年在村里办事,他秉承着一个原则,做事要让上面和村民都说得过去……当然对于村民有诉求的事情,他也会掂量掂量再掂量,能提一嘴的就提,能争一下子的就去争,尽量不给上面出太大的难题。这么多年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失信于民的事情。”这样有责任心的村主任,正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拯救农妇王兰》里的村庄叫靠山村,地处偏远的山区,村民的观念也较为保守。村民谢来财偶然发现德顺的媳妇

王兰在城里一家洗浴店给人洗脸,村主任李振生知道后非常惊讶,决定和文书王元一起去城里把王兰拯救出来。但王兰所在的“足天下”洗脚店非常正规,每个月可以挣1万多元。王兰本不想回去,但李振生许诺王兰回去可以做妇女主任,以妇女主任的身份向大家宣传劳动致富,发动年轻村民一起到城里从事服务行业,带动乡村的经济发展。一番折腾下来,原本打算“拯救”王兰的李振生,反倒被她改变了全村人的守旧观念。相比于小石桥村的万才,李振生更为灵活,一旦发现自己的观念落后了,能迅速调整过来,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市场经济社会,从来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一旦决策失误,就会酿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与张继的其他作品相比,《黄村愿望》更像是一篇乡村风险投资警示录。村里的小伙子要娶媳妇,在城里买一套房子是必备条件。因为凑不够买房的钱,黄村接连三户人家孩子的婚事黄了。村主任王大庆和文书保利一合计,发动村民集资了900多万元,用来解决没钱买婚房的问题。村民在这笔集资款如何支出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每家出钱的人都削尖了脑袋往前冲,都想挤在前面抢先买房,唯恐落在后边。众口难调,王大庆求助于镇长。镇长建议拿这笔钱去投资,就介绍了镇上一家盈利颇丰的石料厂。王大庆觉得机不可失,不顾村民的质疑、反对,将这笔钱入股了石料厂。谁知不久石料厂由于环保不达标,被关停了。眼看这笔巨款打了水漂,王大庆大病一场。如此把全村人的希望押注在一个并不真正了解的产业上,这样孤注一掷的投资,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农民辛辛苦苦攒的钱血本无归,年轻人在城里买婚房的愿望更加渺茫了。这个故事让人看到,新时代的村主任,光有替大伙办事的热情远远不够,还得有经营头脑、经济知识和风险意识。《黄村愿望》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村主任需要具备更高的素养,才能真正为村民谋福利,引领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以说,在张继“村长系列”近作中,鲁南文学村庄里的村主任在变,村民也在变。作家像一个走村串乡的说书人,把一件件乡村小事演绎得波澜起伏,涟漪横生。对村民来说,乡村小事就是家国大事。在乡村基层治理的链条上,村主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张继从不同的侧面为他们画像,其中的意义,不容小觑。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评论

弦上有光 心中有爱

邱振刚

在繁华都市与深山村落之间,在艺术殿堂与简陋教室之间,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俞晓冬用十多年的光阴架起了一座桥梁。丁捷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以下简称《绽放》)以朴实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俞晓冬在身患重病后,毅然放弃大城市里优越的医疗条件,深入位于大别山深处的革命老区安徽省金寨县,为山区儿童开启音乐之门的非凡历程。这部作品不仅记述了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历程,更是一部关于艺术本质、生命价值与教育使命的深沉交响。

作品对山区儿童音乐心灵开启过程的描写,构成了全书的情感核心,是书中最打动人心的部分。作者没有将山区孩子塑造造成简单的“受助者”形象,而是敏锐地捕捉到音乐如何唤醒他们内在的感知力与表达力。当从未接触过乐器的孩子第一次拨动琴弦,当沉默寡言的山村少年通过古筝找到情感出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音乐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审美人格的培育。书中特别记录了云灿、文文、锐锐、志鹏、彭露雅、叶含露等十几个孩子的转变轨迹:从最初对古筝的陌生与弹奏的笨拙,到逐渐领会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再到开始用音乐理解山外的世界。这些细节无声地证明了艺术教育能够塑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俞晓冬面对的困难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呈现:身体的病痛、教学资源的匮乏、环境的艰苦……作者深入挖掘了主人公在这些挑战中的内心波动与坚持动力。当医生、家人都建议她在城市中利用优越的医疗条件静养时,她却选择走进大山。在俞晓冬的支教故事里,古筝不再仅仅是音乐厅里的高雅艺术,而成为连接一个个封闭心灵的纽带。尤为珍贵的是,书中揭示了这段经历对俞晓冬自身艺术生命的反哺:山区孩子的纯粹和俭朴的生活环境让她重新思考音乐、生命的本质;而她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对她的身心健康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这种双向救赎的关系,使故事避免了单方面的奉献叙事,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感。

读完全书,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绽放》这一书名,在俞晓冬的故事中,有着深刻的隐喻色彩。人们习惯将“绽放”与花朵最盛大的时刻相连,而这部作品却展现了另一种绽放——在看似贫瘠的土壤里,用生命本身作为养料,绽放出照亮他人的光芒。俞晓冬的选择,恰恰是对“绽放”这一概念的诠释。她不是在最受瞩目的舞台中央、灯光聚焦的瞬间完成绽放,而是在大别山深处,在与病痛共存的平凡日夜,于孩子们的指尖琴弦上,找到了生命最华美的形态。南京的医疗条件或许能更好地维系她的生命,但山的呼唤与童心的纯粹,却赋予了她全新的生命重量。这种“绽放”,不是被观看的静态美景,而是一种双向的生命激活。当她将古筝从精致的舞台上“移植”到山区的教室,艺术便从纯粹的审美对象,转化为改变生命轨迹的力量。每一首被山村孩子奏响的简单的曲调,都是她生命意义的一次绽放;每一个孩子眼中被点亮的星光,都是她精神世界的延伸与盛开。

《绽放》每章开头都是古筝演奏家俞晓冬对自己经历的自述,看似和支教过程无关,其实别有深意。从全书来看,主线是支教现场的纪实,副线是艺术家的人生历程。两条线并行推进,形成“行动—反思”的对话关系。这种结构打破了单一的线性叙事,让文本产生了音乐般的对位与和声效果,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与立体感。支教描写往往充满现实张力与情感冲击,而俞晓冬的独白如同章节的“序曲”或“间奏”,为读者提供了情绪缓冲与思考空间。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避免了纪实文学可能带来的压抑感,赋予了阅读以呼吸般的韵律。从叙事效果来看,作品若只写支教,主人公易被简化为“奉献者”符号。而自述部分暴露出她的脆弱、孤独,呈现了一个立体复杂的个体。这使她的支教选择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个体在寻找生命锚点的过程中,与另一群生命的相遇与互相成全。这种结构不仅没有割裂文本,反而让支教经历超越了事件本身,成为关于艺术、教育、生命的意义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如何实现的多声部沉思。

《绽放》的语言风格也与其内容高度契合:既有报告文学的纪实严谨,又不失文学性的诗意表达。作者善于运用大别山的自然意象——雨丝、虫鸣、野花、晨雾、山路、茅屋、竹林、星空——与古筝音乐和人物心境相呼应,营造出独特的审美空间。书中对俞晓冬和冬冬的山里娃学生的多个古筝演奏过程的解读也有着不同的用意。有的侧重展示音乐本身的美妙,有的则是以曲笔用琴声的风格变化反衬出人物心态,将古筝演奏与人物心境、故事情节相结合,使音乐成为叙事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绽放》这本书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完整的生命?俞晓冬我们的选择给出了答案——艺术的本质是心灵之间的桥梁,生命的价值在奉献中体现。《绽放》不仅记录了一个温暖的故事,更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灵魂深处的美与善。



《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丁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2月

短评

编年散文如何进入日常生活的细部

——以简平散文集《开合的睫毛》为例

□庞惊涛

简平的散文集《开合的睫毛》以编年体结构,收录其2022年至2024年创作的48篇散文,以流水断章的方式呈现真实的生活肌理,有一种主动聚焦日常生活细部的特质。简平将三年间的个人经历、人物交往与文化观察悉数编入书中,在遵循前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叙事传统基础上,贴近个人体验,关联时代脉络。

“不刻意追求意义”的写作思维

在《开合的睫毛》里,简平像一个返璞归真的世外高人,将时代变迁嵌入到含蓄简淡的个人叙事之中,呈现出一种不刻意追求意义的写作思维。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曾将“无意义”当作严肃的哲学概念,后来,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新小说派代表,先后提出类似的主张。在《开合的睫毛》里,无数的日常琐碎与平凡,似乎都在证明,简平就是在尝试一种不刻意追求意义的散文写作。他在日常细部中的书写,更能传递出对人、物、细节、表面以及时间碎片的价值的重视。这是对散文写作意义的观念革新,即作家不要过多赋予日常叙事高深的文学意义和宏大的价值判断。一旦摆出了“要写出意义”和“要标明价值”的架子,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被消解的可能。经历过多次正面强攻,简平学会了创作的“迂回术”。如《小白和我》写了一段与流浪猫邂逅的场景,《观察一棵树》写小区随处可见的杉树被砍的日常,《疏通堵塞的管道》写都市人为下水道堵塞困扰,这

些文章看似没有鲜明的主题与意义,却充满感染力。我认为,这应该是简平的创作自觉。尽管简平的散文写作并不刻意追求意义,但仍然需要被“看见”,这是编年体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在《爆炒米花》《兔子灯》《五十顶绒线帽》等篇目所投射的时代背景里,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的记录,唤醒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恰如作者自述,“在被看见中,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乃至时代、历史的可能性”。

“有意识”的选材

散文集《开合的睫毛》中,“有意识”的选材与不刻意追求意义的表达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寻找月光花》中简平有意识地记录玛格丽特的探险,还原其执着与纯粹,保留生活质感的同时折射出时代变迁,这正是有意识与无意义共生的结果。

这种关系,在一系列写人的篇目里,体现得尤其明显。《秦怡品质》里,作家选取一个和秦怡在一起的生活断面,有意识地表现这位表演艺术家坦荡从容的品质,在看似无意义的叙事里,触达秦怡的精神内核;《外婆的四达里》一文,从上海的一个寻常里弄进入,综合调动外婆的厚道,在回忆里为外婆的尊严、坚韧、善良、厚感与和睦塑形,也让沉重的亲情母题变得更加轻盈;《同事黄允》是写人散文中篇幅最长的,其作为“忘年交”对作家个体成长、人格形塑的重要性,都体现在有意识的日常生活书写中。简平的写作不像是隔了久远时空的回忆,更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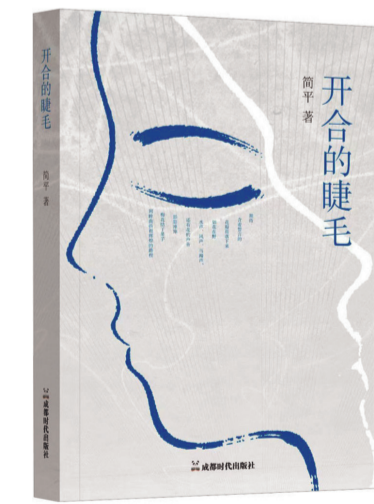
是即席采访。在他笔下,个人日常与时代记忆不是刻意嫁接,而是自然融合。在穿越时空的“对话”中,人物个性、风骨及其时代镜像下的生命价值,也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

散文写作要跳出“流水账”或者“日记体”的窠臼,有意识地沙里淘金,这才见出作者的功力。《聆听树声》《在云端》《唐吉珂德的战役》《承蒙关照》《最后一只蝴蝶》等篇目,通过对题材的精心“编织”和“串联”,为呈现个人与时代的双重印记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观察样本。

重拾“有童心的写作”

作家张炜曾说:“没有童心和诗心,就没有文学,特别是没有纯文学。”他认为,作家需常以儿童视角重返世界的纯净与好奇。当然,我们知道,“有童心的写作”既要避免说教,也要避免出现“伪童心化”,或借“童心”之名行幼稚化、娱乐化、自我中心化之实。而《开合的睫毛》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正是简平在过了花甲之年,重新拾起了“有童心的写作”。散文中,童心的坚守与生命力量并未流于直白的说教,如《海上童心》对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期许,《慢慢绽放》对生活节奏的感悟等。这得益于真诚朴实的文字和充沛饱满的情感,也正是当代散文最重要的品质。

从题材、叙事以及语言三个维度来审视,这本散文集注重从真实生活里长出童心,《碉堡顶上的童年》《爆炒米花》《海上童心》等篇目直接聚焦童年记忆与成长现场:《为孩子带去一块魔毯》则以儿童为本位,关



《开合的睫毛》,简平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6年1月

注孩子的内心、阅读、想象力与成长困惑,以文字守护童心;《大城市里的小水坑》《小白和我》《如花在野》等篇目则注重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引导孩子们在琐碎里看见奇迹,在平凡中看见诗意。这种有童心的写作,在题材的选取上侧重于“对世界的温柔与惊奇”。从叙事角度来看,是“蹲下来讲”,而不是“站起来说”,即便在《说说孩子写作文那事儿》这样的篇目中,在批评虚假作文、倡导真实表达时,也没有明显的说教痕迹。散文集保持温情、悲悯、治愈的叙事基调,如《文学里总有一种生命的力量》《祝福咖啡》等篇目,虽然触及成人世界的病痛、离别、失落、困境,却仍然能保持温暖、明亮、有希望的情感质地。

简平的语言朴素直白,贴近口语,短句多,修饰少,像孩子说话般自然,拒绝书面腔、文艺腔、宏大词,有一种“呼吸感”。他的散文不是写给孩子的童话,而是一个年过花甲的作家,以赤子之心回望世界、理解生命、温柔书写的“精神童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者系出版人)